

W I N T E R I N C H I N A

B e r t S t e r n

温德先生

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

〔美〕伯特·斯特恩 著 马小悟 余婉卉 译

- ◎ 见证北伐、抗战、内战、文革激荡六十年
- ◎ 清华、西南联大、北大，百年来最传奇的洋教头
- ◎ 与吴宓、叶公超、陈福田共事
- ◎ 闻一多、费正清、李约瑟引为挚友
- ◎ 一代学人季羡林、李赋宁、杨绛、何兆武皆曾亲炙其学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W I N T E R I N C H I N A

B e r t S t e r n

温德先生

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

〔美〕伯特·斯特恩 著 马小悟 余婉卉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5-744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德先生：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/（美）斯特恩（Stern, B.）著；
马小悟，余婉卉译. 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301-26040-1

I. ①温… II. ①斯…②马…③余… III. ①温德, R. (1887 ~
1987) —传记 IV. ①K835.65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6120 号

书 名	温德先生：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
著作责任者	〔美〕伯特·斯特恩 著 马小悟 余婉卉 译
责任编辑	张雅秋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6040-1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网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学出版社
电子信箱	pkuwsz@126.com
电 话	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
印 刷 者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	新华书店
	965 毫米 × 1300 毫米 16 开本 23.5 印张 273 千字
	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	5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部联系，电话：010-62756370

中文版序

1984—1985年,在北京大学讲授英语文学和写作的一年里,我时常骑车去燕园一角那局促的温宅拜访温德先生,听他口述人生。当时温德先生已经九十七岁,他几年前曾被一辆自行车撞过,后来就几乎瘫痪在床。不能站立走路是一桩痛苦,但与此同时,老年痴呆也如影随形,只偶尔有片刻的清醒。连读书读报都不能,温德先生已徘徊在生死边缘。他问我,能不能做点什么减轻他的痛苦,我竟无言以对。也许死亡才是他能期待的唯一慰藉。但是,一个念头划过我脑海,也许我可以为他做这件事:把他的人生讲给世人听。我还有一个略微自私的目的: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,听温德先生讲他的人生也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国家。

在中国,温德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。他的好友包括陈岱孙(经济学家)和吴宓。他与吴宓一起设计的课目为中国各重点大学英文系所效法。温德还与蜚声国际的英国学者瑞恰慈通力合作,在中国推广基本语教学项目,但该项目蒸蒸日上之际,却因日寇入侵而流产。温德交友很广,其中还包括杰出的汉学家费正清。二人曾一起向美国国务院陈情,要求停止对国民党的支持,虽然失败了。

如果温德先生仅仅是一位书斋里的书生,我也许不会对他那样好奇。温德身兼如此之多的角色:冒险家、画家、阿黛尔·戴维斯(Adelle Davis)营养学的追随者以及精力旺盛的活动家。他曾为了保护学生和同事而与国民党官员作对,面对将刺刀刺伤他小腹的日

本兵，他以怒目吓退之。他曾英勇支持抗日事业，也曾努力保护闻一多，可惜后者还是未能逃脱国民党的暗杀（温德与闻一多最初相识于芝加哥，温德之所以来到中国，与闻一多关系很大）。

30年代的北平，用蒲乐道的话说，“是一座历经五个朝代浮沉的灿烂城市”，温德在此有滋有味地生活着，涵育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趣与追求。但随着历史大幕一道道拉开，他发现自己处乱世，身如浮萍，比如沦陷时期的北平，为了护卫清华校产而与日寇起争执，却徒劳无功；后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，饱受物价飞涨和每日空袭的摧残。

温德的晚年愈加凄惨，他不但是个洋人，还是个知识分子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饱受欺辱。在北京大学，他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，只能编写英语学习材料，以便同事们就教学问题来求教时给予一些指导。但这时的温德已经学到了中国式的隐忍，在住宅附近的荷花池边散步成为他的幸福一种。但瘫痪在床之后，他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，内心的平静终于崩塌。

我静静地聆听温德先生讲述他的人生，也保证会把这一切付诸文字，希望以此给他带来些许慰藉。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，而命运选择了我来做这个事情。我无比感谢能有这份幸运。感谢北大校方，感谢我曾访谈过的温德的多位同事与学生。他们让我得以认识温德先生，对温德先生的认识拓宽了也丰盛了我的人生。

目 录

中文版序/1

引 言/1

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纳人/16

第二章 抵 达/41

第三章 清 华/65

第四章 瑞恰慈与中国正字学会（1923—1937）/88

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中国正字学会/110

第六章 保卫清华/122

第七章 去往昆明之路/141

第八章 联大之困/153

第九章 正字学会的终结/180

第十章 重回美利坚/202

第十一章 昆明的胜利/223

第十二章 奋 斗/244

第十三章 回 家/255

第十四章 谁丢失了中国/276

第十五章 冷战到来/291

第十六章 闻一多的骨灰/313

第十七章	中国解放/331
第十八章	“文化大革命”/350
第十九章	再见,温德/359
译后记/370	

引言

这段旅程始于1980年9月,彼时我教英文的沃巴什学院收到一封来自罗伯特·温德的信,他称自己为学院最年长的在世校友。尽管七十五年里没有一个人听闻过他的音讯,他的说法却证明是事实。他解释道,这些年来自己主要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任教。^①

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推荐王汝杰入学。温德已经指导了王汝杰几年,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接受美国教育。王汝杰的表现无愧于温德的赞赏。他不只是一个优异的学生,更是一位能干敬业的老师。我和王汝杰谈论书籍和罗伯特·温德——他曾是王汝杰父母的同事,并担任过好几年王汝杰的导师。^② 我为温德着迷,这位神秘的老人1923年去了中国,从此几乎长居于斯,除了二战期间曾短暂返美。当然,我们也谈论中国。在那种语境里,我好似一个初学者,久久沉迷于唐诗,亚洲泛灵论(我曾去印度旅行),以及“文革”,不过实际所知往往寥寥。

那段时日我受《西行漫记》影响很大。久为学者圈中一员,我相信,作为一个阶级,如果我们和农民多待一阵儿,分享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,我们会变成更有趣更进步的人类。我在一间没有暖气的

^① Robert Winter to Trustees of Wabash College, August 30, 1980, RAC Special Collections;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(unsorted).

^② 王汝杰父母分别是王岷源和张祥保,都是北大英文系知名教授。——译者注

粗陋木屋中住了几年,我珍视在那儿的收获,与“教养不高”的邻居一起过较简单、不那么舒适的生活,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。我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他国家展开艰苦旅行,还认为自己在毛泽东眼中,应该不像我的许多同事那样亟需一场文化革命来洗礼灵魂。

实际上,我充满了各种对中国的幻想,即便听王汝杰讲述他当红卫兵的经历,我也未能全部摒除这些幻想。例如,他曾经和一群红卫兵围攻、审讯身为北大知名教授的父亲。但他“文革”故事中淋漓尽致的狂暴让我着迷。在这所位于印第安纳州一块玉米地的小学院里,我感受到终身教职的安稳和拘束,令人索然。在某个时刻,我知道,就像一个人一辈子有那么一两次会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,我需要去中国。

我的妻子,已经在日本生活过几年,也对去中国倍感期待。至于我们五岁的女儿安娜……好吧,二十年前我曾带着两个小孩去希腊的塞萨洛尼基,我凭富布赖特奖学金在那儿的一所大学教了两年书,这种连根拔起的生活并没有伤害到他们,因此我准备再次检验自己壮游的信仰,且带着孩子。

诸事具备,尚缺教职,王汝杰差不多为我谋了一个。他的父母都是英语系受人尊敬、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教授。通过他们,我获得了一个一年的职位。通告很简略:“校长邀请您下个学年授课。正式邀请函稍后奉上。”我还记得收到任职电报的那一天。这个巨大飞跃的真实性,让我倏忽不知所措。我想我脸色苍白。那时正来学院访问的罗伯特·布莱(Robert Bly),对我说了三个词,巨大而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生命:“That’s just fear。”(那只是害怕)我第一次意识到,那不是害怕,而是恐慌,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
当我们在肯尼迪机场踏上登机通道时,相同的震动不出所料地

击中了安娜。“我去那儿过夏天,但不要待一整年”,她宣称,并死死抓住通道扶手。我不得不把她掰下来,当然很难受。她不肯安定,直到空乘给我们送餐。冒险剥下餐盘锡纸,探寻下面的神奇食物,她沉浸其中,看起来总算发现了这一趟的好处。

我们在华的最初时光有许多值得一说:安娜如何进入一所容纳五百个孩子的幼儿园,好几个月都一言不发,直到会说幼儿园通行的汉语;我们如何骑着自行车勘察校园,发现圆明园毗邻北大,被毁的宫殿和破损的石兽如何成为安娜最爱的游乐场。我们起初都因太无知而体会不到文化冲击。我们眼前的一切是平静的,即便人们整齐划一地穿着毛式的中山装,甚至有明显可见的军事主义,而校园广播一天两次高吼指令和节拍,要求所有身体健全的人一齐做操。当时还发生了一些神秘之事:比如,我的学生会给我带来一些官方的纸条,我必须签署,然后还给那个坐在访问学者宿舍门口的小干事——而我花了几个月才接受事实,即“文革”只是在名义上结束了,我的学生和同事们仍然被紧紧箍在那个令人谨小慎微的系统中。

改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多次私下和学生聊天,但其内容必然限于我能理解的范围。当这个范围扩大,有些学生,包括那个如同“私人导游”、文化翻译的聪明年轻人,开始教我们一些东西——例如,他指着党内高官集体亮相的新闻照片,说有张面孔不在其中,这是已经发生的一场政治大变动的唯一线索。另有一次,他告诉我,有位画家被捕,因为他描绘标准场景时多了几笔阴霾,在当局看来这就是政治批判。

我之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来看透现状,还因为,我们有一阵和其他“外国专家”一起下乡,这些活动是为了标榜当局的仁政。例如,有次访问一处解放军基地,我们目睹某个突击部队正在训练障碍项目和白刃互搏,令人印象深刻,呈现在我们眼前的,是军民鱼水情。我

们离开时深觉中国是和善的。毕竟那时,即便老练如费正清也对毛泽东的革命怀有同情,就像温德一开始的感觉。

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984年的夏末和秋天。更具真实感的事情呈现在我眼前,始于我第一次拜访罗伯特·温德,他的寓所在校园北隅。我见他时,他97岁,两年前被自行车撞后就卧床不起。他常常昏睡或迷糊,绝不像个适于交谈的对象。我第一次拜访他是正式的,目的是给他捎去沃巴什学院院长路易斯·索尔特(Lewis Salter)的口信,带给他索尔特签署的荣誉博士学位证(不久它就挂在温德床头上方,我不知道这是否出自他本人的意愿)。

温德一开始就吸引了我(主要是第十八章所写的第一次拜访),我旋即意识到,我要尽量多地和他交流。我的想法有些自私。如我所说,我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,温德的经历让我看到中国的前景,他在中国度过了动荡喧嚣的20世纪。不过我也有不那么自利的动机。温德陷入了困顿,病痛和周遭环境让他无望——他知道这些,也时常抱怨,要我想设法帮他解脱。讲他的故事,对我来说,是我给予他某种解脱的唯一方法。他对自己这一生是否有价值心存疑虑,而我在还不太了解他做过什么有价值的事之前,便早已觉得——他此生是值得的。

一开始,我可以拼凑的故事如同幽灵。他脑海中不同时期的人和事件互相交织成一个奇怪的原型。更悲催的是,我对中国历史实在无知,所以基本无法将访谈材料聚拢起来,只能尽其所能地被动记录。这些访谈对我们俩的情绪都造成了纷扰。

我,梦一般地骑着单车,沿着清风拂过的荷花池,去向校园西北角的小屋,在并不太久远的过去,这一区域尚是皇家猎场的一部分。在门口,温德的佣人会跟我打招呼,这个姓王的女人并不很情愿见到

我,因为我的来访会让老人变得躁动而难以平静。不过,她对我仍算和善,希望从我这儿找到下家,她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先生们的好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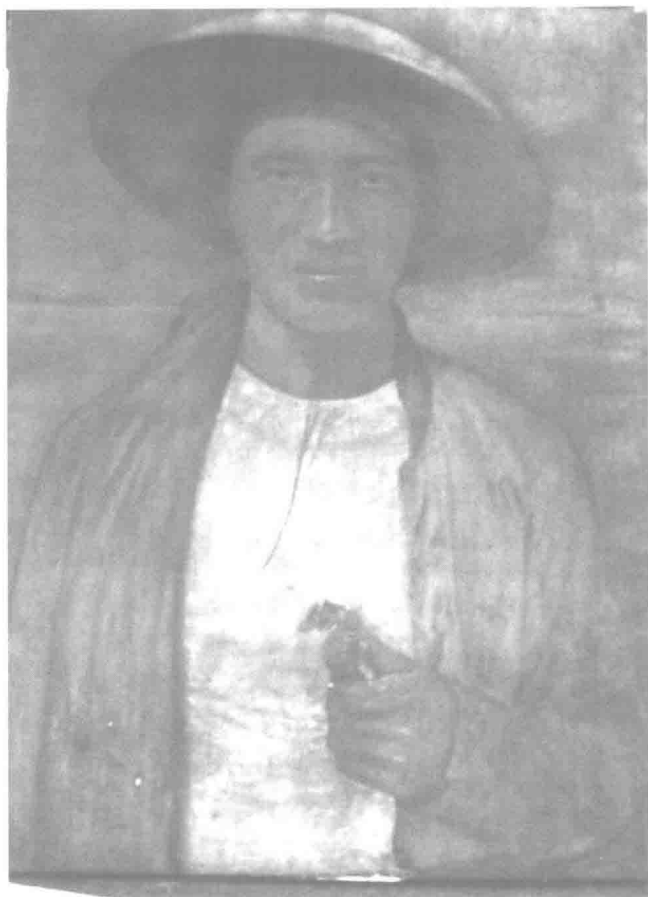
进了屋,她会带我穿过一间小的前厅,那是她和丈夫住的地方,走过一条短的廊道,它从右切入一处橱柜般的空间,那是老温德曾经的书房,现在的卧室。这房间窗子紧闭,有一格玻璃由结实的木板取而代之,这样老人就无法因为暴躁、尿味袭来而打破它。他时常昏睡着,一个大块头,穿着有夹层的中山装,填满了、甚至看似要溢出那小床,他满面憔悴,几如死人。

一套经典雕花的柚木壁橱覆盖了整面墙(我无法想象温德如何在战乱和逃亡中将它保留下来)。他早期生活的其他痕迹挂在墙上。有幅清代的画,画上是位穿红色斗篷的大胡子男人牵着骆驼翻越雪山。人和骆驼都带着一股圣洁的傲然之气凝视着澄澈的山巅穹顶。这是一幅行者的图画,它赞美那种孤独和无畏的追寻之旅。它对面的那幅油画,王岷源告诉我,那是温德还不到五十岁时的自画像:如上图骑马者那样大而粗的胡须,有着那种专横的、英国式的英俊。温德的另一幅画,现今属于我了,上有一位年轻的渔夫直视着我们,右手握着一只小海马,明显是表达情欲。

其他东西只有几样:一个卷轴,上面的几个大字为:“辞旧迎新,百花齐放”;沃巴什学院的奖旗和奖状挂在温德床尾那面墙上;一台彩电,这是最后一扇为温德打开室外天地的窗户。

* * *

在那个房间,我们展开了最特别的交谈。有次我来访,他思索起“现在正影响我的人”。这些人,他说,不都是好影响。“他们有他们的错误——某些错误。但我对这些错误的纠正未必更好……就好像



温德的藏画

中国已经看到了它的未来,不论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。”说这话的人衰老而极度无力,除了我之外已经很久没有影响过别人了,因而这些话听起来近乎荒谬地夸大,要不就是疯了。我不得不提醒自己,温德的意识不再受时间所限。在任何时刻,他都会说出他曾经生活过的各种时间框架。影响过他的人包括:他的佣人,对他的生计直接负责的大学当局,以及中国政府本身。当我想到他常年工作在为中国铸

造政治和智识前途的那个体系的中心,他的话就变得格外有意义。

在我看来,在这些拜访中,第一种联结形式是:布满这个小房间的,构成了一部庞大的历史,横扫时间,跨越大陆,经由远大希望和破碎幻相的辩证法,将东方和西方都运送到我们站立的这一时刻。沿着这些线,一个沉睡、衰弱的人物形象对我来说堪比寓言。

温德的任务,如同他及他的东西方雇主们所了解的,是在两种文化间开展双向阐释——一种是他生于斯又半断绝来往的,一种是他试图在其中塑造自我、获得包容的。他“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任何人都久,最理解中国”,他以前的学生们这么告诉我。他想写一本书,希望它能有助于深化两个国家之间的了解。

确实,一种新文化的前景,东方和西方的因素都熔铸其中,这两方又各有瑕疵,此前景萦绕在大西洋两岸的知识分子的心智中,比如西方的约翰·杜威、伯特兰·罗素、瑞恰慈(I. A. Richards),在东方书写这样一种新型文化的是梁启超、梁漱溟、胡适,直到战火高炽,所有思想付之一炬。无论如何,经过了北伐战争、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、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,及至“文革”结束,温德已然 85 岁。

他不止一次对我说,“你能想个什么办法让我离开这儿?”我当然不能。这所房子,这些佣人,他身心的糟糕状态,他的人生将他引到这儿,而且不能再引到更远了。他好像海岸上一条失败的大鱼,呼吸着他最后的痛楚。我想不出任何办法让他离开这儿,除了尽量精准地想象他的生活,将他垂死的现在搬回那活力四射的往昔。

一个春日,我给下午的班讲完课,骑车去了温德的屋子。我答应为他推轮椅散一会儿步,此时花儿含苞欲放,在干旱的北京土壤里,近乎奇迹。温德几乎一年没有从屋里出来了,他极度渴望离开他的

房间。我们计划散步的那一天，他告诉我，他不想谈论过去，他宁愿有点儿新东西，新的比老旧的一切都好。“必须要有些改变了，……没有什么比过去的那些更糟了。”

他不是说过去是坏的——他尤其不想被误解成这样——而是说他陷落在一系列灰暗、一成不变的岁月中，眼睁睁看着自己退化。他有点像库米的女巫(the Cumaean Sibyl)，缩小了，悬挂在瓶中。但与她不同，他不想死。就在几天前，他透过窗户瞥到一张褶皱的泡沫塑料丢弃在他的老房子前，这几乎是他在窗子里能看到的所有。“外面的那个白东西是什么？”他想知道。我解释了，但他仍很焦躁。“它用来干嘛？有人死了吗？”不，它什么也不是，就是工人丢的垃圾。“它是为我而放的吗？”他坚持问。

但到了我们要外出的这一天，他却忘得一干二净。“你迷信吗？”他问我。我告诉他我不迷信。他解释道，过去曾带他出去散步的某些人，很迷信，因此拒绝推着他过桥或跨水，说那儿有恶灵潜伏。但温德家坐落于几个小荷花池的中间，如果不过桥或跨水就不可能带他走很远。

结果似乎是，恶灵作不作祟不取决于桥，按原计划应散步的那天，刮起了一场北京大风，我去告诉他，我们不能外出了，因为戈壁风沙之类的。不过，当我到了那儿，却发现天气不碍事。温德从前佣人（已经去世，温德曾与他长期“交战”）的儿子，在院子左边的一个什么地方，正挖着花，想偷走那个支撑着大而老的丁香花丛的架子。而温德不知道或不在意我是谁，尽管他意识模糊地觉得我是一次演讲比赛的冠军。他的身体，铅色的，比我此前所见都要有生气，他对我发号施令：“别坐在那儿。时间在浪费。叫当局。不。走，马上。”

这个老人糟糕的精神状态，已成为一种慢性病，有一个明显的主

要肇因。他身上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发生了。他已经不能动了。对他来说,在进入暮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,生命和能动是同义的。“我记得”,他告诉我,“我曾生活得很不错,在这个地方周围散步,远到你目力所及,到了水边,到了水”^①。他思忖了片刻,继续说:

我不能走路以后就完全变了个人。能走路时,我可以去任何地方——这儿那儿——去看各种东西。现在我哪儿都去不了,什么都看不到。我想,不能走路是很糟糕的——我能在这世界行走的时候是多么有意思。我可以走到任何一个角落,检视我从远处看不见的那些小细节。我发现这比我在美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地方要有趣多了。

温德经常谈论他一想到自己是不是“足够好”就不安、焦虑,我用这个宽泛的短语是指,他是否从容卸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道德和心智的使命?因此,可以重构他的生活,以能够实现的形式让他找到出路,逃离萦绕不去的自我怀疑。我第一次拜访时,他告诉我,他想“清除自己”。他从无个人抱负,他说,他想“变成空无”。人们为什么现在来看他?他真的想知道。而尽管他想成为“空无”——这个抱负充满了所有东方式的混沌——现在他想从我这儿,从任何人那儿知道,他的人生是否有意义,人们怎么想他。他想听到一些补偿性的评判,因为显然,这位前天主教徒有时害怕因自己是同性恋而被投入某个真正的地狱。他的佣人王阿姨,曾是个妓女,而他与她——他曾说——因为彼此的罪恶而接受惩罚,凑在了一起。

他的某些懊悔以一种更世俗的途径降落下来,通过多个对他的

^① 温德此时说的是“shui”——“水”的拼音。——译者注

批斗会(有进攻性的审问),其间他一再被教育,要承认自己曾经的行为,过去秉持的价值,都是他反革命倾向的证据。因而我能想象,我俩之间可以建构一个世界,我们在里面一起散步,检视事物的细节,弥补他的过往。

借 T. S. 艾略特(T. S. Eliot)的话说,我该如何“捡起这些碎片以支撑(他的)废墟”?他就像我舌尖的一首诗,醒着的一场梦。曾经,当我离开戴乃迭和杨宪益(大量英译了中国文学的翻译家)夫妇家,杨夫人祈愿我的传记计划顺利,但她哀伤地摇头说,“你在云雾中做事”。

而我确实是在云雾中做事——一位老人的碎片记忆,一些报纸故事,他在世朋友的逸闻趣事,他们也是已经老了或正在老去的男男女女。

有时温德努力想参与。“可以问我任何问题”,他会说。我便问,但他却忘了我问到的情节、人物或时期,他会道歉,退回他自己的废墟中郁闷思索。“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人真奇怪”,他有一天告诉我。“你瞧,我似乎混淆了传说和事实。”

我当然意识到我来得太迟了。他生活的真实形状正在消融,有些已经完全消融掉了。

而他稍微清醒时,知道我要写他的传记,他也想这样:

我是一个想成为中国人的美国人。但我不是一个好人。我害怕的就是我自己不够好。所以有人会出现并想弄清楚我够不够好。不知为何我感觉你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。问题是你够不够好。

* * *

幸运的是,我在中国的那一年(1984)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,或